

伟大的历史文献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

红旗出版社

D 229.11

伟大的历史文献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

红旗杂志编辑部编

红旗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伟大的历史文献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体会

红旗杂志编辑部编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96,000 字

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52,000 册

书号 4160·1 定价 0.70 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石仲泉 (3)

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二十八年的光辉纪录	缪楚黄 (25)
-----------------	------------

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前进	王忍之 (62)
------------------	------------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

除旧布新的三年	高智瑜 (82)
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	孙瑞鸢 (97)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王梦奎 (115)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杨增和 (132)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正确分析和认识“文化大革命”	邵华泽 (151)
----------------------	-------------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朱元石 (169)

历史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
伟大转折郑 惠 (185)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和毛泽东思想

论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贾春峰 (203)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光辉旗帜卢之超 (223)
实事求是，百战不殆丁伟志 (246)

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历史的经验揭示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正确
道路滕文生 (264)
团结是我们党前进的力量所在马仲扬 (286)

编 者 的 话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它回顾了党的六十年战斗历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它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决议》是党心、军心、民心的集中反映，所以它一公布，就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列宁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选集》第3卷第361页）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深入学习

《决议》，我们相信通过对《决议》的学习，一定可以达到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工作的目的。

为了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决议》，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我们约请了一些理论工作者，按照《决议》的八个部分，分题撰写了阐述《决议》内容和精神的体会文章，汇编成书，供大家在学习时参考。这些同志在盛夏酷暑中辛勤劳动，于很短时间内，写成了这批文章，使我们能够及时出版这本书，在这里，特向他们深致谢意。

由于本书出版时间仓促，特别是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五日

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石 仲 泉

我们党在建国以后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三十二年伟大而不平坦的历史道路。党的路线、理论、方针和政策，受到了实践的反复检验。我们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饱尝过沉痛的教训。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同志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对建国以来的这段历史进行过认真的总结，发表了许多启迪思想、富有胆识的深刻见解，对我们党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很有帮助。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集中了全党的正确意见，吸取了这几年总结历史经验的一切好的成果。

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在一首咏庐山的名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幸，痛定思痛，回顾历史，一时难以排除感情的纷扰，把建国以来的历史错误看得过重了，不能得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看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应以冷静的理智头脑和科学分析的态度严格地解剖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曾说过：看问题，第一要客观，不要主观；第二要全面，不要片面；第三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这三句话，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法作了精辟的概括，也是我们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这次发表的《决议》正是运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出了深刻的总结，对三十多年的重大历史是非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也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成就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初期，就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仅古老时代的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活动同样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斯大林正确地指出：“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

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版第505页）在我国，从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以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就已成为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创造者。我们每个人作为新生活创造者的一员，都参加了这一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人所进行的一切，也是为了这一伟大的事业，并在这一伟大事业中起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因此，回顾历史，首先应该把我们国家三十二年的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奋斗的历史，而不只是党的某个领导人的功过记录，更不应当把党的领导人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起来。只有这样站在国家主人翁的立场，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囿于个人不幸遭遇遗留的创伤，来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不为纷繁错乱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紧紧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本质，比较客观地看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基本点，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它把我们党的事业看做是人民的事业，把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看做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并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作为评价历史、衡量是非的尺度。这样，对于建国以来的历史的总结就得出了顺乎事理、合乎民心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客观的，它揭示了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实际面貌；这些结论是积极的，它振奋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继续为社会主义而贡献力量。

《决议》指出，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历史，并且对三十二年来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主要成就作了概括。《决议》列举的这些成就，是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的客观事实。当然，这些成就还是初步的，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与人们期望的还有很大差距，确实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过去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把落后当先进，这样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但是，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随着我们自己的弱点、短处、落后面的不断暴露，随着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和挫折对国计民生的影响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于是就忽视和否认我们的成就，把自己的国家看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这也是不对的。我们国家与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是落后的，但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要做具体分析。我们国家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一样，把一些不可比的东西拿来进行简单的类比，是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我们不反对比较。并且赞成拿客观条件大体相同的对象进行合理的比较，以便从有启发性的对比中帮助分析问题。例如，拿我国同原来在许多方面有类似之处的印度相比。这两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或解放的，有古老的文明但又是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大国。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对比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哪种社会制度优越，看出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

印度经济专家拉马斯瓦米去年到我国进行访问，对印度与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作了一番比较。据这位专家提供的材料说，在1949年，中国远比印度的条件要差，但是到了1980年，这两个大国走各自选择的道路的结果，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例如：粮食产量，中国是33,000万吨，印度只有14,000万吨，而印度的耕地面积比中国还多3,000万公顷；钢，中国是3,300万吨，印度只有800万吨；煤，中国是60,000万吨，印度只有12,000万吨；石油，中国是10,600万吨，印度只有1,200万吨；发电量，中国是2,820亿度，印度只有1,030亿度；新铺铁路线，中国是30,000公里，印度只有10,000公里；自行车，中国生产1,000万辆，印度只有400万辆；手表，中国年产1,700万只，印度只有400万只。（注）就人民生活而言，这位专家说，按人口计算，中国的平均收入两倍或甚至三倍于印度；尽管在印度上层社会中占人口10%的最有钱的人的生活远比中国人富裕，但是其余90%的人的生活，则是中国胜过印度。另外，据有关统计，从1949年到1979年，我国的工业生产增长41倍，印度只增长4倍；我国的农业生产增长2.7倍，印度只增长1.2倍；1979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为253美元，而印度只有183美元；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中国为326公斤，印度为201.2公斤。当然，应该指出，印度也有印度的长处。这些年，印度人民在提高粮食产量、发展现代化工业、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等方面所做的努力，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比较从来都是相对的，也是有局限的。我们不能据此轻率地去作什么全面的结论，但是，从这一比较中，有一点是

很清楚的：中国和印度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是很大的。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对我们建国三十二年来的成就不能低估，不要自己小看了自己。消极悲观、妄自菲薄的情绪是没有根据的。《决议》说，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决议》中的这个结论的正确性，通过上面的对比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实事求是地肯定这些成就，不是为了炫耀或自满，而是为了肯定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力，肯定我国人民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我们已经占有的阵地，也是继续前进的基础。我们要百倍地珍惜所取得的成就，并要以极大的努力去发展这些成就。

以历史的分析态度， 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曲折

《决议》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三十二年，我们在指导方针上犯过错误，国家遭受过重大的挫折。应当怎样看待建国以来的历史曲折呢？

首先，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历史发生曲折是不足怪的现象。人类的历史从来就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在往返曲折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估计历史的最复杂、最离奇的曲折现象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神，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要求不走一点弯路，

不发生一点挫折，这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认识上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世界历史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历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算起，一百多年来的发展经受了挫折。就拿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一段历史来说，经过了几起几伏。社会主义的力量时而扩大，时而缩小。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还只在少数国家取得了胜利。就已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不是也有几个国家发生过政治动乱、经济崩溃的危机吗？在有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甚至已经得而复失了。同这些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发展，应当说，是比较巩固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动乱，社会主义制度巍然屹立，就充分说明了它在我们国家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历史的曲折毕竟不能逆转历史前进的方向。

其次，我们国家的曲折和挫折，是在探索社会主义的前进过程中发生的。我们原来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大国，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但是，经过党领导下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并且决定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这不是任何外力强加于人民的，而是人民自己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极端的革命性”。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帝国主义的极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

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83页)

当然,也不可否认,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所遇到的很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未曾预见的。没有经验,探索着前进,有时可能成功,有时就难免不发生失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的指导方针没有失误,并且探索出了在我国胜利实现改造的独特道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也曾希望找出一个好的办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种种社会政治矛盾,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对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仍然存在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政治矛盾缺乏认真的研究,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特别是酿成某种严重的政治事件之后,我们党就没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对这些新的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而习惯于沿用过去的老经验来解决,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看做全面的阶级斗争,并且照搬那种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法。这就导致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最后发展到象“文化大革命”这种全面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对于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我们既缺少经验,也缺乏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其他方面的国情认识不足,过分地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能动作用,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急躁冒进,这就造成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的

失误。这些失误和挫折无疑给人民带来了不幸，但是应当把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的挫折，同剥削阶级的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压迫人民，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所造成的危机区别开来，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划清了这条基本界限，才能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历史曲折。

第三，对错误和挫折的不同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建国以来，我们发生的错误和挫折的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决议》对这些错误和挫折作了深入的分析，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区别：（一）把全局性的错误同局部性的错误加以区别。作为全局性的错误，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其他如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只发生在一定范围内，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二）把指导方针的错误同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工作加以区别。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搞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一九五八年初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落后面貌所激发的革命干劲、创造精神和共产主义风格，还是可歌可泣的。就经济工作而言，在填补工业空白、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布局，发展科研项目和推广新技术等方面，还是做出了成绩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方针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在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还是应当肯定的。在十年里，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坚持生产，使国民经济在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被中

断，这也是不能抹煞的。（三）把纠正错误不彻底同没有纠正错误的情况加以区别。“文化大革命”前的错误，除了少数没有认识到的以外，只要认识到了的，都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决不是一点没有纠正。政治方面，在一九六二年前后，既给“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又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政治帽子。经济方面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底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纠正，只是由于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被打断了。从一九六〇年冬以后，我们党以巨大的努力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当然，那时的纠正是不彻底的，但是，不承认我们党为纠正认识到的错误所做的努力是不应该的。错误大小不一样，知错不改和知错就改也不同。

第四，对错误和挫折不应当只从消极的方面去看待。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错误本身是不好的，但只要我们认识了错误，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它就会成为正确的先导，变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发生的几次大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使过去制度上的弊病，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从而使人们对它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采取的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就是深刻地认识了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们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就是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一定要